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40
12 July 1976

CHINESE

第一九四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芬奇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意大利)

博亚先生

周南先生

勒孔特先生

海恩斯先生

安倍勋先生

基希亚先生

米尔扎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

达特库先生

森德贝格先生

哈尔拉莫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萨利姆先生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四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毛里求斯总理就以色列对乌干达共和国发动的“侵略行为”提出的控诉

- (a)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非洲统一组织驻联合国助理执行秘书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126)
- (b)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毛里塔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128)
- (c) 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12123)
- (d) 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124)

主席：根据安理会在第一九三九次会议的决议和在理事会的同意下，我提议邀请乌干达、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色列、卡塔尔、肯尼亚、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几内亚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哈罗德·沃尔特先生、乌干达代表阿卜达拉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冯韦希马尔先生；几内亚代表杜库雷先生、肯尼亚代表韦亚基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和喀麦隆代表奥约诺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除了议程所列的各份文件以外，我还收到了索马里代表的一封信，要求被邀参加安理会讨论议程上的问题。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我提议，在安理会的同意下，请索马里代

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现在我请索马里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它面前的议程项目。在请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以前，我要提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下列加添的文件：载有墨西哥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全文的第 S/12135 号文件、和载有索马里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全文的第 S/12136 号文件。

我现在请几内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几内亚代表杜库雷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在请几内亚代表发言前，我要请利比亚代表发言，他请求就程序问题发言。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请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就程序问题发言。

我代表利比亚代表团，强调我们现在讨论的议程项目是简单明确的。它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恐怖主义实体对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乌干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所进行的侵略罪行的。在第 S/Agenda/1939 号文件中，得到安理会的一致同意一点也不含混地显示出的议题如下：

“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毛里求斯总理就以色列对乌干达共和国发动的‘侵略行为’提出的控诉”。

阁下，因此请让我向你表示热切的希望，希望你以主席的身分，请各位发言人只就安理会目前处理的议题发言。

我要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博士所作的真正努力，帮助救济和减轻恩德培惨案所予人民的苦难。我同法国代表一道，对秘书长不能出来，象

我们大家所希望的，预问这件事情，表示遗憾。正如法国代表所说那样，我们深信他的伟大的道义上的权威，在影响到联合国会员国的情形中，应该是一种极有价值的资产。秘书长参加我们这里的辩论，就证明了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安全理事会注意的。

事实上，还有什么能比公然侵略一个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更严重的呢？

秘书长在他向安理会发言时，毫无疑问地受了人道主义考虑的促动，说维护每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原则：

“……并不是用来考虑安理会今天所讨论的这类案件的唯一因素。”（第一九三九次会议，第7页）

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博士继续说：

“当国际社会需要在目前处理因国际恐怖主义行动而产生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时，情形更是如此。这些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曾经受到我一贯的谴责，它们引起了许多带有人道、道德、法律和政治性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共同同意的规则或解决办法。”（同上）

我国代表团欢迎秘书长向国际社会所作的诚挚和高贵的呼吁，特别是通过联合国所作的呼吁。联合国正在通过大会议程上题为“防止危害或杀害无辜生命或损害基本自由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和由于困苦、挫折、怨愤和失望，以致有人不惜牺牲人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以求实现彻底改革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的根本原因的研究”这一个项目处理这个问题。它在大会第三十一届常会临时议程暂定项目一览表中列为项目112。

我们知道秘书长并不打算要安理会的讨论离开它的明确议定的议程。而且，在这方面，我还要提到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的第S/12134号文件所载美国常驻代表给主席先生阁下的信。我国代表团要声明，上述来文的内容同正在讨论的项目是无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表示保留，并希望这一行动并不是试图使我们的

讨论离开已经协议的议程、扩大我们辩论的范围和给议程一个错误的解释。

主席先生，我再次希望你能使辩论按着安理会已经协议的路线进行，以取得圆满而有效的结果。我国代表团将会反对任何在辩论劫持的幌子下劫持辩论的企图。

主席：谢谢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提出程序问题。

我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作为一个程序问题，我想请你告诉我：程序问题应该在什么时候才算是一个程序问题？

主席：我所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就是念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条：

“如有代表提出程序问题，主席应立即宣布他的裁决。对其裁决如有异议，主席应将其裁决提交安全理事会立即作出决定。裁决非经推翻，仍为有效。”

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斯克兰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希望向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常驻代表保证，我们要求分发这封信的用意，就是使每一个人都清楚知道在这一公约和协议中，同这一议程项目的辩论，不论是它的题目和它所包括的信件，都有密切联系——真正非常密切的联系——的各项规定。这是在事先进行的协商中都已经表示得很清楚了。

此外，我还要提一点意见。就是希望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政府能够象对要议程的不受劫持一样，有兴趣于为世界创造一个没有劫持飞机的局面。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们不要再占安理会的时间了，我们要继续辩论。但我要向美国常驻代表保证，我国利比亚同所有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一样，向来是谴责劫持行为的。我国已经签署了关于劫持的两个公约。非洲统一组织曾经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所有会员国都谴责劫持行为。阿拉伯联盟谴责了劫持行为，巴勒斯坦兄弟们也谴责了劫持行为。

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为劫持行为作辩护，而是不容许以任何令人发生错觉的手法来掩盖对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蛮横侵略。假如有人希望要讨论劫持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也愿意讨论的。大会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就讨论这个问题了。假如作为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另一个项目，我们是愿意而且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但不是作为侵略一个非洲国家的口实的同时来讨论它。

主席：在回答这一程序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各安理会的理事国代表都知道这个通过的议程上的项目和其所以这样提法的背景。我认为基希亚大使也提到了秘书长讲话中一部分可以配为说明这个整个项目的有关部分，因为这份讲话中也有其他的有关部分。

最后，我认为安理会的惯例一直是，任何一个项目都有相当自由解释的余地，这也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当然，每一位参加者都有紧扣着项目的责任，但对于项目的解释却并不一定要这样谨严。我认为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现在我们继续辩论。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几内亚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杜库雷先生（几内亚）：主席先生，几内亚国家党代表团十分荣幸地在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时候，向你表示诚挚的祝贺。

我国代表团受到非洲统一组织的委托，前来参加我们议程上的辩论。但是我国代表团在开始讨论本题之前，要为朱德委员长的逝世向中国代表团表示哀悼，他同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是分不开的。

主席先生，你十分胜任地代表的国家，由于其高度的智慧和对人类历史的深刻认识，长期以来在人们中间享有威望。近几年来在我国已经有了把意大利和几内亚共和国联合起来的互相谅解的友好情谊。

主席先生，我想引用你在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第六委员会所作杰出发言之一中的一段话。当时你因为认识到要为“国际恐怖主义”一词下一个一般性定义困难，你说：

“研究恐怖主义的起因，要象研究人类其他一切活动一样应该专心一致甚至抱着同情的态度。意大利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某些形式的暴力行为是有其经济、社会及政治的根源的。因此，单是抑止并不就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还应该追本寻源消除国际大家庭中不平衡的现象”。

主席先生，你的这个思想，有力地说明贵国政府将会以开明的态度来协助裁判非洲统一组织为以色列对乌干达共和国的侵略行径所提的控诉。

非洲统一组织不会为这个情况所困扰的，因为它坚决谴责一切恐怖主义的行径。它同世界一切力量一起谴责这种邪恶。可是谴责行动不能只限于某种恐怖主义，而是应该从头到尾适用于事情的整个过程即它的真正起因和一切后果。这次的控诉之所以强调侵略行径，是因为联合国在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中关于侵略的定义的第一条中已经明确规定侵略一词的含义。任何想把我们的控诉变成是对恐怖主义性质的讨论的企图，都只能清楚地显出那种只问结果，不问原因，故意要把是非颠倒的用心而已。

几内亚是一个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它的目标是要解决经济困难和一切使人

眼界变得狭隘的情况。它切望尽力作出最大的贡献，为世界谋致和平、正义和普遍的安全。这就是它猛烈谴责一切劫持抢劫、掠夺、屠杀和破坏行径，包括对外国领土的非法和无理占领的原因。它强烈谴责千百万亚非拉人民的强暴和杀害。当一个民族以对待牲畜的方式在对待另一个民族的时候，最可怕的恐怖主义便会应运而生，因为这是恐怖主义的根源。

那些在历史上一向是苛待他人而善待自己的大国，并不能比非洲觉得可以骄傲，因为非洲并没有恐吓过其他民族。各会员国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联盟正要决定犹太国建国的地点的时候，有人提议在几内亚的福塔贾隆，也有人主张在乌干达和安哥拉。为了把我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一点，我要在这里提到一篇题为《当安哥拉险些成为犹太国的时候》的文章；这是刊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一张犹太报纸上的，所以它是代表以色列的观点。文章说：

“葡萄牙前殖民地安哥拉，近几个月来成了世界新闻的中心，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六十五年前，这块非洲森林地区险些成为一个犹太国。这个离奇的故事是从赫茨尔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发生分裂开始的。随着英国建议乌干达和肯尼亚为犹太人家园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很深的裂痕。赫茨尔和其他人，包括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赞格威尔，愿意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对于他们说来以色列这块土地是第一个选择，但主要的是为东欧受压迫的犹太人找一个庇难之所……当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后决定非要以色列这块土地而不要其他土地之后，赞格威尔便同他们决裂，自己组织犹太领土协会。”这段回忆极端重要。以色列和恩德培虽然相隔数千公里，但犹太复国主义的军用飞机却要远途航行以实现其旧梦，即成为乌干达的主人。

对劫持者的最后通牒表示关切有几个国家，以色列并不是其中唯一的国家。在最后通牒中劫持者将他们的要求传达给以色列、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肯尼亚和瑞士的政府。除以色列外，其他国家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尽其力之所及，即保持警惕，机智行事，避免弄到最坏的情况。

如果乌干达不允许这架受扰的客机在恩德培机场降落，这架飞机肯定就会因燃料不足而撞毁，所有的乘客都会立即死亡。那时国际对乌干达的抗议将会更加强烈。法国本身就不得不要它的代表尽快向阿明总统陈情，让这架飞机在恩德培机场降落。因此，在这样危急情况下乌干达做出了它应该做的行动是无可予以非难的。如果说接受这样一件毒包袱便是纵容劫持的话，那么法国向乌干达政府陈情，要求这架飞机在恩德培机场降落也不能辞其咎。

法国是富有经验的。它知道文明的价值，尊重国际法。这就是它之一定会象它那样做的原因。它一定不会让洛亚达事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所用战略的例子。当其他有关国家都本着完全团结合作的精神，协调行动，以求问题的解决的时候，以色列却以其特有的不忠不义，滥用了伙伴们对它所予的信任。

以色列骄横跋扈，顽固不化，一心以破坏为出发点，冒着杀死一切有关人士的危險，把其伙伴丢在一边，单独入侵，单独用机关枪射击，单独进行谋杀，举起沾满鲜血的双手高呼：

“在对恐怖主义进行的斗争中，这次营救行动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这是以色列为人类和反对国际恐怖的斗争所作的贡献。”

以色列对这种骚扰并不满足，它不仅不承认有罪，反而还说：

“不应当把这次行动看作是最后一次。它将在我们继续努力的进程中给我们以鼓励，但斗争并没有结束：还将需要新的努力、新的方法和不断推陈出新的技巧。”（S/12123，附件，中文本第3-4页）

乌干达成了它自己的人道主义和过分相信人类的道德价值和力求臻于至善境界的牺牲品。乌干达相信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大不列颠的诚意。它觉得自己已卷入其事，有责任充当解决这一微妙事件的联系人。它等待着，在受人愚弄的面前依着理性行事。可是，乌干达的这种诚意，却为侵袭机场的事件所阻挠。它在等待着谈判，可是却等来了刽子手。因此，乌干达和整个非洲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经受了一次最严重的欺骗，这一天正是美国的二百周年纪念日，而以色列却以恩德培大屠杀来表示庆祝。

以色列胡说什么非洲国家为其野蛮行动拍手叫好。多么无耻的诬蔑啊！难道会有非洲人乐意看乌干达在这次营救行动中流血吗？难道会有任何非洲妇女或小孩他们宁可这样做而说：“这是与我不相干的事，可是却还要我为它付出代价？”

我们有过达朱、布痕瓦尔德和奥斯威辛的痛苦回忆。我们有过千百万犹太人烧成灰烬的痛苦回忆。可是，这些炉子是在思德培、在乌干达和在非洲吗？

纳粹分子是以色列的头号敌人。以色列怎样惩罚他们呢？以色列说非洲人懦弱，这是什么意思？让有罪的狮子自由逃走却拿驯良的羚羊来审问，这不是真正的懦弱么？在以色列看来，真正的罪人不是那些在纽伦堡受审的人，而是那些在消灭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吸取最好教训的非洲人民！他们由于不能消灭达朱和奥斯威辛，便拿非洲人民来出气。他们以火烧思德培为快。那些对这种行径表示赞扬的人，只能更进一步地表明他们是怎样的一种人，和鼓吹的是怎样的一种道德！

我们听到以色列为它的侵略行径的辩解是：犹太人再也不会经历被人点出来和同别人分离开来的恶梦。可是，是谁在布痕瓦尔德把他们点出来和区分开来的？是非洲吗？是谁在达朱把他们点出来和区分开来的？是乌干达吗？是谁在奥斯威辛把他们点出来和区分开来的？是伊迪·阿明总统吗？当然不是。伊迪·阿明元帅不懂得怎样分辨他们，乌干达或非洲也不懂得如何分辨他们。可是，他们不起来反对纳粹分子，却拿他们认为是软弱的非洲来出气。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尊严，我们一定回敬这种蛮横的态度。

在这里，有许多先例被引用来为这个野蛮行径辩解。许多书籍、篇章和作者都被提到，被曲解为根据国际法他们有权杀死每一个人和有权宣布只有他们自己的国家才是世界上唯一爱好和平的国家。然而国际法却比这个文明得多，比这个合理，比这个合乎人情。它不许侵犯一个主权国家的领空；不许在一个国家作未经批准的降落；更不许破坏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

法国航空公司飞机正驾驶员所说的话是这一件事的最好的明证。请允许我引

用《纽约时报》题为“飞行员说非洲人没有代枪手站岗”的文章，这篇由詹姆斯·克拉里蒂先生所写的文章把这件事情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有些关于思德培机场事件的报道说乌干达军队曾经代替劫持者在看守人质，可是五十二岁的正驾驶员米歇尔·巴科斯的说法似乎同这一报道有出入。

正驾驶员巴科斯说乌干达士兵从来没有来接替过劫持者。”

尽管正驾驶员巴科斯说对伊迪·阿明元帅表示的感谢，解释有误会，他指出，我们引述如下：

“乌干达当局曾作出努力，使人质有适当的物质供应。”

我们相信，法国当局对于这位高级职员身分是具有信心的。他是这架飞机的唯一指挥者。没有一个乘客比他更有资格更能准确地报道所发生的事情，除非这个人要压制真理，要撒谎。

我们要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这个先例所构成的真正危险。以色列希望树立这种先例，因为它相信一定不会受到惩罚。吉姆·霍格兰先生写了一本荣获普利策国际新闻报道奖的书书名是《南非；冲突中的文明》。他在该书第七十一页中写道：

“对于非洲荷兰人来说，他们所处的困境同以色列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和以色列人基本上都是欧化的白人，从一块居住着绝大部分是具有敌视态度的非欧洲人的土地上硬划出一块土地成立他们自己的国家；如果非洲荷兰人和以色列人要顺从联合国和依赖世界舆论的话，就会被这些非欧洲人所消灭。他们的宗教信仰很相似，彼此都是“上帝特选的子民”。对于民族主义政府来说，以色列是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另一个前哨。”

作者在这一页的下端写道：

“《纽约时报》精明的外交事务专栏作家苏兹贝格在一九七一年从约翰内斯堡报道说，南非军事学校对以色列一九六七年采用的策略十分重视……。苏兹

贝格是一个态度认真的新闻记者，他报道说，‘未经证实的传言’说南非在六日战争期间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以色列研究策略，而以色列也把他们在瑞士弄到的关于法国海市蜃楼战斗机引擎的秘密图样传给了南非。”

难道我们就不可以想象南非已派了一个秘密代表团到这个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的新学校去学习侵袭罗安达、马普托、康纳克利或阿尔及尔的艺术呢？我们知道南非已通过一条法令，使它有权用武力干预任何对这个种族隔离政权的利益和安全有威胁的非洲地区。

根据《犹太记事》周刊一九七六年七月二日的报道，我们知道有二万名以色列人住在南非，并且知道在索韦托有一间叫莫里斯·艾萨克森小学，它是最近发生屠杀事件的学校之一，就是以纪念一个于一八九六年移居该地的犹太人命名的。

我们知道以色列和南非已经列出了一张联合武备的清单，南非报纸《星报》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那一期也证实了这件事。我们引下面一段作为证明：

“以色列的军队共有常备军 34,000 人，应召入伍的士兵 122,000 人并在七十二小时之内可以动员 400,000 人。我们的军队只有 50,000 人，其中应召入伍的士兵为 35,400 人，可以临时征召的民兵为 138,000 人。而且，以色列的大炮的数量远远超过南非，并有一批威力极大的反坦克火箭。它有三十八个旅……。”

这些对联合军力的计算，如果不是为了制定侵略非洲和威胁要全部消灭我们人民的计划，又为了什么？

如果我们的辩论的题目是要克服国际恐怖主义，那么我国代表团一定主张彻底消灭恐怖主义，而且从消灭引起这种行动的根源开始，即铲除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对其他国家的非法占领和一般的帝国主义。几内亚共和国决不同意把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与破坏别的主权国家的机场混为一谈。我国代表团把这种行动视为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国家的恐怖主义行动。

如果安全理事会考虑到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不能审查提交给它的控诉——如果马马虎虎让国家支持的强盗行径变成合法，而让以色列逍遥法外，那就等于告诉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已经掉入了装扮成牧羊人的豺狼的圈套，而我们这些人所唯一能够做的安全措施就是避免我们自己之间的互相对立。

从现在起，必须在我们敌人的同党和我们自己的同党之间划清界线。我们自己的同党是那些同我们一样渴望着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国家，是那些提供的援助不会在明天变成屠杀的来源的国家。几内亚共和国代表团深信世界人民不会为以色列对它这一次冒险行动所作的辩解所欺骗。我们深信这次的行动除解救入质之外还另怀目的。对乌干达的米格机的袭击和对机场的破坏不是对劫持者的报复措施，而是对联合国会员国乌干达国的主权的侵犯。

为了这些理由，我们依照委托给我代表团的任務向安全理事会呼吁：

第一，强烈谴责以色列对我们弟兄之邦乌干达共和国的侵略行径；

第二，要求以色列立即赔偿其飞机对乌干达人民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和

第三，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国际法败坏到它本身就可能危害到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地步。

主席：我感谢几内亚代表对我，特别是我国所说的客气话。我也要感谢他引述了我在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所作的发言。我必须说，这对我非常有用，我现在就不需要去找这句话了。

现在请毛里求斯代表发言。

哈罗德·沃尔特爵士（毛里求斯）：主席先生，我搞不清我应该要祝贺你还是同情你担任这崇高的职位，因为戴上这顶皇冠是不轻松的！尽管如此，我还是祝愿你任期成功。

我要同在我之前的几位发言者一道恭敬地向伟大的领袖，朱德元帅致敬。他在这个时候去世是国际上的一个损失。作为一个民主的公仆，他这种以说服而不用压服的外事哲学，应可为那些在和平协商、耐心讨论和克制容忍的艺术方面需要得到进一层指导的国家的榜样。

作为非洲统一组织部长会议的主席，我有责任同我们的姐妹国家，几内亚和埃及一道，支持我们的姐妹国、乌干达对以色列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至四日夜间公然侵犯其领土的完整和主权所提出的正义的控案。

以色列常驻代表在发言时，一开头就提到 Civitus Romanus Sum；我相信他的意思是指 Civis Romanus Sum（罗马民法）——承认一个国家有责任保护其在国外的国民的原则。不错，事实上，这个世界并不是属于罗马的，同时，罗马人也不能屠杀别国的国民而不受惩处。罗马变出了帝国主义的颠峰。承认一国有责任保护其国外的国民是对的，但是这原则并没有诱致该国去糟踏别国神圣的完整。

听以色列代表在那样强辞夺理诡言巧辩地陈述那个亡命之夜之前的一切经过时，胆小一点的人差不多就会被他吓死。如果我们冷静下来，不去想入非非，我们就不能不注意下面这些事实。这是在整个事件中是有关一方、对那架飞机、航员和乘客负有责任的法国代表所证实的；我现在引他的话：

“法国当局在获悉劫机发生后，立即通知一些法国大使馆，包括坎帕拉的法国大使馆在内，请它们采取措施以便准许这架飞机着陆，因为它很快就会耗尽燃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坎帕拉的大使为这事同乌干达当局打交道，乌干达当局立刻准许这架飞机着陆。”（第一九三九次会议，英文第82页）

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独立而客观的证据，安理会可以从我的说明中看出为什么

它可以是驳斥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所述理由的基本根据。这一小部分独立的事证驳斥了以色列代表在他的发言中所说的：

“劫机犯的目的地依照预定计划”——用语的关键是“预定计划”——“是乌干达坎帕拉城外的恩德培机场。”（同上，英文第37页）

根据我刚才引用的两段声明，无需多作说明，已可证明乌干达不是这项牵连广泛的国际恐怖主义行动的共谋，但是，以色列代表却把它说成是：

“我们之前的大量证据显示乌干达政府对整个事件是预先获悉并主动纵容的……”（同上，英文第42页）

从我刚才引的法国代表的话来看，所谓预先知道一说，是很容易把它推翻的。

所以，现在只剩下以色列代表发言里的第二点——“纵容”。让我们看他这种说法有没有理由，有没有一丁点证据。这里，我再要引那个推翻不了的法国代表的话为证。

我顺便要向这崇高的安理会的理事国指出，我们已经听过了乌干达方面的陈述，也听过了以色列方面的陈述。如果有怀疑，那就应该听独立方面的说法——就是法国代表对安理会所作的最客观、冷静而没有任何火气的陈述。

“通过伊迪·阿明的努力，几分钟后旅客被准许离开飞机，并得到了一些食物，还有了一名医生来照顾他们。从那时起，似乎至少有一部分旅客是由不属于第一批劫持者的人在监视；乌干达士兵则在50米以外担任外围的安全任务。”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时十五分，伊迪·阿明元帅向法国大使转达劫持者所定的放回人质的条件。索马里大使当时也在场。他强调他是以资深的阿拉伯大使的资格被选出来代表劫持者的。之后，就把劫持者的一切条件转给了各个有关的政府。”

“六月三十日，在坎帕拉的巴解组织代表通知我们大使说，劫持者可能在当天释放妇女儿童。有四十七名旅客确实在下午一时被释放了。”

“当天下午五时，我们从当地的无线电台得知劫持者已对乌干达总统说，

“如果各有关国家没有在七月一日下午三时以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准备炸毁飞机和所有还未释放的人质。”

当我们继续从法国大使的说话中去理解事件时，这一段的重要性是很显然的。请听下列日期和日期：六月三十日五点钟，和第七月一日十点钟。我继续引法国大使的话：

“七月一日，在波恩，阿明元帅接到了法国大使，法国大使要求阿明元帅设法营救所有的人质。阿明元帅答复说，法国大使的要求是合理的，阿明元帅予以死长的。”

“到七月一日，在波恩，阿明元帅不久，乌干达政府宣布由于伊迪·阿明元帅对塞浦路斯，曼拉等回意第一，除以离列国政府和法国籍的以色列人外再释放为二，在七月一日，第二，把日期定到七月四日上午十一点。在飞机员要求在释放所有旅客之后才释放他们。”

“七月一日上午晚些时候，巴黎的以色列大使通知法国外交部长说，以色列政府准备释放劫持者所提名单上的“若干囚犯，以换取人质的释放。他要求埃姆帕拉拉大使把这一消息通知乌干达总统。以色列政府表示希望通过法国的斡旋可以谈判交换人质的条件。”

“同日下午三时，大型客机上的乘客和旅客确已获释并由索马里大使移交给了法国大使当天下午乌干达总统接见了法国大使。索马里大使也在场。法国大使向他们转交了以色列政府的来文，并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出来斡旋。”

“在一天快完的时候，索马里大使把劫持者的信件通知我们驻埃姆帕拉的大使。他们说他们准备研究各有关国家释放所提囚犯的条件，并声明他们反对要联合国秘书长出面斡旋的建议。”

“同时，法国外交部长通知以色列政府，同意与法国大使根据联合国政府的总领导进行释放人质的谈判。”

“七月二日，以色列大使宣布以色列政府的立场：”

“劫持者将在日期：七月一日六点和七月二日十一点。”

“关于其具体交换的条件（一九六九年会议文件第三一四一和第三一五页）”

“通过乌干达总统，旅客才被许可离开飞机和获得食物的。我们能不顾这个事实吗？由于乌干达总统的招待，才第一批释放了四十七名旅客。我们能不顾这个事实”

吗？经过乌干达总统的调停，才又释放了一百名人质，我们能不顾这个事实吗？通过乌干达总统的调停，才把最后限期从七月一日延到了七月四日十一点，我们能不顾这个事实吗？

尤其是，我们能不顾那架飞机的驾驶员，巴科斯机长所说的话吗？——一家可靠的报纸《纽约时报》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报道：

“对我们的看守完全是由劫持者在严密监督。乌干达士兵从来没有来接替过劫持者”。

《纽约时报》继续报道说：

“昨晚，飞机的一位飞行人员代表全体航员宣读了一项声明，赞许乌干达伊迪·阿明总统在人质被扣留期间对他们“不断的照顾”。巴科斯机长今晚说，那项声明被误解了，全体航员的意思只是说：‘乌干达当局曾作出努力使人质有适当的物质供应’。”（《纽约时报》，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第4页）

我们能不顾，在这样微妙的谈判中，任何一方都必须消除敌意表示出一点迁就的精神来的事实吗？平心而论，我们不但应该指责乌干达总统参与纵容，而还应该赏识他表现出来的、真如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那种热情、忍耐和努力。

不幸，并且可悲的是，乌干达所费的一切努力和心血所得的报偿却是，以色列响起了战号当着全世界精塌乌干达一辈子说不清，死了它自己的一些人民和留下一个永恒的烙印。邪恶的品质虽已经得到了承认和受到了赞扬，但是邪恶的本身却是不可饶恕和不可原谅的。

我不打算提到任何别的国家，但是非洲的国家总该要警惕，在我们的队伍中不许会有分裂。也许，我可以引约翰·多恩在他《沉思录 22篇》中的几句话：

“不要猜那夜钟是为谁而鸣。也许正是为你。没有人是能独善其身的”。

不管怎样去处罚一个国家，都无法引起它的犯罪感的。我们看到以色列代表在巧妙细致的犯罪的荣耀之下洋洋得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和平的代价是勇气和随时准备为尊崇荣誉而付出一切代价。碎心的罪愆是要付的。

非洲统一组织一九七〇年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它斩钉截铁地谴责任何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同时还准备竭尽所能支持《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

组织规章中所载关于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不可侵犯的神圣原则。

联合国的宗旨就是要通过集体和共同的防卫以保证个别的安全。美国大使威廉·斯克兰顿说过：

“非洲象征着铲除殖民主义最后残余，使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能够决定它们自己的命运和克服他们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重担的挑战和希望。”

以色列代表对我们说：

“以色列的营救行动并非是针对乌干达。以色列军队并不是在攻击乌干达。”（第一九三九次会议，英文59—60页）

但是他同时又谴责乌干达帮助并教唆了那伙恐怖主义者，并且给它扣上一顶“主动纵容”的帽子——而说他们没有攻击乌干达；攻击的不是乌干达的士兵。

我们准是生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二十多个乌干达的士兵死了，还有许多受了伤。但是，就是那些人，那些负责保卫和安慰人质的人，却反而在以色列枪手之下付出了最大的牺牲。

实际上，自从乌干达总统接到请求出来调停以后，事态的发展是会得到一个——并且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总统已快可以消解着这个定时炸弹，而且在那个痛苦之夜也并没有任何事实预示这一件戏剧化的坏事会有一个致命的收场。

在结束之前，我可以从几家可靠的报纸上引一些精采的片段，使我们了解，不可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卫报》说：

“多年来人们反复询问的一个问题是在军事上这样逞强和莽闯的国家何以在政治的和平谈判中就变得那样拘谨。只要它能够略为用一点在这次进行救援的灵机，中东的局势就不知已经改变多少次了。”

《金融时报》说：

“中东问题追根究底是巴勒斯坦问题，并且只有在温和的巴勒斯坦领袖们得到谈判解决的希望时才能够开始得到解决，如果因这次事件而进一步鼓励以色列忽视上面的这个现实，那么这次的救援行动将会变成一个悲剧而不是一个胜利。”

作为一个非洲的子孙和非洲人，我对这次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侵犯感到关切。小的独立国家还有些什么保障？因为这次危险的先例，我们岂不是整天要生存在恐惧的笼罩之下？

但是，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主席先生，我在结束时愿请你和安全理事会的各位理事默想一下下列几行诗句：

命运啊，我们总会知道你的意向，
我们知道，我们必有一死，
只在迟与早。
苟延下去，
也只是一段贪生怕死的日子。
扑上去吧，非洲人啊，扑上去吧！
让那流血的行动来染红我们的双手，
染红我们的手臂和我们的刀剑。
然后挺进，齐驱到恩德培，
高举我们红色的武器，
齐声唱，“和平，自由与解放”。

主席：谢谢毛里求斯外交部长提到我国长久的厂史。尤其要谢谢他的祝愿和悼词，这一些都是使我铭谢不已的。

海恩斯先生(圭亚那)：阁下，不巧，杰克逊大使没有来，但是，他曾要我为你的担任安理会七月份主席向你表达他最热烈的祝贺，和圭亚那代表团的祝贺。作为你在安理会内最接近的同事和紧邻，他曾在过去十八个月中，当安理会费尽心血，设法解决许多复杂问题的时候，与你有过许多愉快的时刻。杰克逊大使和圭亚那代表团的其它人员完全相信，你的智慧、你的经过考验过的外交才能、你的机智和你的耐心一定能使得安理会在你的任期之中达成公正的决定。在处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中我们保证完全支持你。

主席先生，我还要代表我国外交部长和杰克逊大使向你表示谢意，谢谢你对他们上个月主持安全理事会工作的赞誉。当然，上个月安理会的审议问题，所以能够得到这样圆满的结果，实际上应归功于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孜孜不倦的努力。

请容许我代表圭亚那代表团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朱德同志的去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表示我们最诚挚的哀悼。朱德同志在指引中国人民解放的进程中发挥了有力的作用。他的努力曾是许多人的精神鼓舞。

对许多人而言，七月四日是一个欢庆的日子。几千万美国人参加了一项计划好的庆祝活动，庆祝他们成立独立国家和决心保卫主权的二百周年纪念。同时，全世界坚持自由事业、主权完整事业和个人自由事业终必胜利的人们也都和那些美国人一起在参加这一次庆祝。

但是，还有些人却为了另外一种原因而在欢庆——因为有些人在那一天实行了一个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以他们浅短的眼光看来是成功的。我说的是由以色列政府筹划、准备和执行的对黑色非洲国家乌干达的侵略以及世界某些部分的人和政府对于这事的反应。

但是，对另外一些人讲，七月四日却又是哀痛的一天；因为那一天，许多乌干达人被以色列侵略者无情地枪杀了。由于以色列对乌干达无耻的、赤裸裸的军事侵略，许多乌干达人被杀或受了伤。乌干达人哀痛，我们其他许多人也为他们哀痛。

安全理事会今天召集会议的原因比联合国本身还要老。其中显著的原因是一些人相信他们天生的优越性以及他们和另外一些人要以强权和势力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国际大家庭却已经在这许多年里逐步订出了一些实现国家平等、主权平等观念并使国际关系以尊重以联合国宪章为其最高权威的国际法为其基础的准则。

目前的这个事件，即以以色列对乌干达采取军事行动的事件，《宪章》第二条责成各会员国，包括以色列在内：

“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尤其是，经过联合国二十五年的辛苦努力之后，举世都接受了一个侵略的定义。一件不折不扣的侵略行为便是：

“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侵入或攻击另一国家的领土；或因此种侵入或攻击而造成的任何军事占领，不论时间如何短暂”。（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附件）

以色列在七月四日对乌干达所采取的行动完全是赤裸裸的野蛮侵略。圭亚那强烈谴责以色列这种对黑色非洲国家乌干达的侵略。

我国政府在七月八日发表了下列声明：

“圭亚那政府最强烈地谴责以色列军队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对乌干达领土的入侵。这种行为完全违反了国际法的常规，尤其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宪章》要求充分尊重各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以色列政府的这种行动，再一次地表现出它不仅完全不顾这些基本原则，并且也完全不尊重一个黑色非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圭亚那政府深切关注有人已在把这次恩德培机场事件予以传奇化，尽量想把注意力从一件本质上只是一个国家侵入另一个国家的领土的事件上转移开

去的企图。这种侵略、这项军事冒险、这种完全不顾后果的行为——这种行为很可能就会造成破坏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后果——一定会激起人类的良知而对以色列实施全力的国际制裁。如果让它逃过这种全力的制裁，就会造成危险的先例，损害到那些只靠信守《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国际行为准则才能生存的国家”。

以色列最近这次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所作的侵略行为引起了许多基本问题。重要的有想把这一行动传奇化的企图和其处心积虑——也可以说是蓄意的——蒙蔽国际社会使它认为以色列的行动是合法的、应当的。不然的话他们何以一定要一再地说，在恩德培机场被打死的以色列士兵是“从背后受击”？否则的话，为什么纽约这么多的大众新闻媒介又会对七月四日以前就释放了大批人质的事实轻轻地略过不提？为什么，以色列难道想把它对乌干达的暴行比作当年英国在海上称霸时代的查缉奴隶贩卖？难道以色列认为国际法还是停留在十九世纪的阶段？还是以色列愿以国际海盗自居？

此外还有别的问题。第一，我们安理会不谴责以色列的行为，就会为国际上违法的行动创下极其危险的先例，这还能有什么疑问吗？因为此例一开，小国的安全便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它们的领土和主权便都要受制于那些甘于用强盗手段的国家的胡作妄为。

最后，我们还要反问：以色列会不会对一个欧洲国家采取类似的行动？

先前我曾提到有人想把以色列对乌干达的行动说成有理。他们说人的自由重于主权，如果以色列为夺取它国家公民的自由，认为需要侵犯别国主权的手段的时候，它就可以这样做。这只不过是炮舰外交的一种新说法；因为承认这样的原则，就把国际社会从一个滑道上推落到强权就是公理的境地。

安理会所应遵循的原则是那些载在《宪章》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信守维护、不令其腐蚀的原则。没有那一国，即使是以色列国，有权暗地里破坏这些

原则或利用这些原则来谋取它自己一国的利益。为了短期的政治目标而企图把以色列的行动说成有理就是勒索整个国际社会。象以色列这样硬把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动说成正当就是把许多坚持信守国际法律的小国置于绝对权力的支配之下。圭亚那是不会明知故犯参与这种阴谋的。

同样的，圭亚那也坚决尊重人命。我们不宽恕劫持飞机；我们对于每一件有意义的、无谓的损害到无辜男、女和儿童的生命的事件都很惋惜。

那些想要曲解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即：以色列侵略乌干达——的意义的人只会给国际社会通过大会对国际恐怖主义探求通盘解决带来更多的困难。圭亚那随时愿意在适当时候、适当场所、对正在进行中的探寻贡献出它的力量。

虽然在此时此地的新闻媒介中反映得并不清楚，反对侵略的呼声是从未沉寂过的。单看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在为许多国家和许多人民发言时说的话便够了，他说：

“这种行为不能不引起不结盟国家的愤怒，构成国际关系上的一个危险先例，为种种冒险行为开了先河”。(S/12132, 附件)

同时我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在一项直率而有胆识的声明中也指这个行动是对会员国主权的严重侵犯。我们注意到，秘书长的意见曾引起某些方面的严厉评论。但是，我们愿意向他保证，他在和平与正义事业方面的不懈努力，一定可以得到我们的继续支持。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在判断这个问题时能清楚地洞察到它所牵涉的真正问题，不会因短期的政治利益而有亏其依照《宪章》的宗旨原则以执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守。

主席：谢谢圭亚那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以及他对意大利出任主席所表示的信任。我对于我们同杰克逊大使和圭亚那代表团中其他同事的友情睦谊的感觉，也是同圭亚那代表相同的。

在名单上还有四位发言人。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打算请两位发言人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下午再恢复辩论。因为没有人反对，我就这样进行。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让我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接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位。更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欢迎一个同为欧洲经济共同体会员国的代表担任主席，而我们又与这一个国家有着极其密切和友善的关系。我们很高兴这个重要的会议能够在你的任内进行。同时我也要向你的前任，圭亚那外交部长和杰克逊大使表示祝贺之意，他们在六月间主持那些有时甚为疲累的辩论时曾表现出高度的技巧。

我也想借此机会就朱德之丧向中国的代表团表示我们最诚挚的哀悼。

安全理事会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审议七月三—四日晚间在恩德培国际飞机场发生的事件，尤其是以色列政府为了解救困在该地的人质所采取的行动。但是，我们都知道，事情的开端并不是在该处，而是在六月二十七日自雅典飞巴黎的法国航空公司的喷射客机之被劫持。因此，我首先必须正式以最强硬的态度对这一空中强盗的行为和其后在恩德培机场扣押 250 以上无辜旅客和机员作为人质的行为表示我国政府的严厉谴责。我国政府认为，国际社会在一九七六年的今天还依然要受到这种新响马的勒索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这种罪恶的行为使无辜的人遭受到生命的危险，打击国际社会的基础，我们认为整个国际社会应该对之加以谴责并表明其不齿的立场。对于因此行动而在恩德培机场丧生的人，我们深感痛惜。同时，我们也为许多无辜的生命得以倖免和劫持的企图终于遭到应得的失败而高兴。

上星期五，乌干达外交部长在回答以色列代表时对多拉·布洛克夫人事件作了一些很不平常并且毫无根据的指控。布洛克夫人是一个拥有以色列和英国双重国籍的英国公民。事件的真相如下。

当我们初听到法航飞机在六月二十七日受到劫持的时候，就探询飞机旅客中有没有拥有英国国籍的以色列国民。法航与以色列当局后来告诉我们已经没有了。到七月四日，星期日，我们才获知，在七月二日释放出来的人质中有一位多拉·布洛克夫人，她已进入穆拉戈总医院，我们便立刻命令驻在坎帕拉的英国代理高级专

员协助布洛克夫人离开乌干达。

七月四日晚，高级专员的一位职员到医院中去访问布洛克夫人，就是说，这时候以色列飞机已经离开恩德培机场很久了。因此，乌干达外交部长上周五在本理事会说布洛克夫人在七月三日晚已离开医院，他们把她送回恩德培机场，以免其他人质的生命因她而受到危害的说法根本不是事实。在以色列的行动之后她还是留在那里的的事实，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法国大使馆也派过人到医院中去看到她来说，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事实。

在我国政府完全相信以色列进行突袭时和突袭之后，布洛克夫人一直是在乌干达的手中。

七月九日我国驻乌干达高级专员见了阿明总统。他告诉阿明总统说我国政府无法接受乌干达政府的声明，并且表示英国人对布洛克夫人的下落非常关切，他并希望她的失踪能够立刻获得调查。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国务大臣今天在下议院的声明中将英国政府的立场表示得很清楚。我在下面直接引用他的话。

“七月一日，我——指国务大臣——曾向下议院说，我们已派高级专员回到坎帕拉去同乌干达政府迫切而彻底地讨论布洛克夫人失踪的事。亨尼西先生——即我国高级专员——在七月九日见到阿明总统。七月十日乌干达政府寄给亨尼西先生一封信，继续表示不知道布洛克夫人在什么地方，还说她和所有其他人质的下落，都应该送回以色列。如我们在当时所表示的，这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因为高级专员办事处中有职员在以色列突袭恩德培机场之后还在医院中见到过布洛克夫人。我们对乌干达已作的调查工作，无论如何都无法感到满意。”

声明中继续指出：

“今天早上我国高级专员自坎帕拉回国。我已经得到他亲自的报告。听了之后，我只能极为遗憾地向下议院报告。布洛克夫人肯定是在七月四日早

上九时三十分（当地时间）从她在穆拉戈医院的病室中被带走的，现已不在人世。对她的家属，我们表示最深的同情。不管布洛克夫人是如何死的，乌干达政府必须将负责人绳之以法。”

从我上面所说的就已经很清楚可以看出，我无法很确切地告诉安理会布洛克夫人到底遭遇到了些什么。非常可能的是她已经死了。只有一个政府能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假如这个政府到现在还不知道的话，它是唯一有办法去调查的政府。这个政府就是乌干达。我们现在就指望它去调查。

我们在此非常注意地和有兴趣地聆听了先前的辩论中乌干达和以色列的代表对六月二十七日的劫持和七月三日以色列所采行动的描述。

安理会的每一位理事都会注意到两位代表所作的解释有着显著的差别。但是从这一切很清楚地表现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再度出现，就是说尽管我们中间许多人都相信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去尊重所有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一国政府却仍旧为情势所迫，必须在另一国的领土中采取片面行动以保证它公民的安全。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现在应当将它的注意力集中到问题的这一部分上，即注意避免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而不去追究恩德培发生事件的是非。

劫持问题是一个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的国际问题。在我们审议的这件事发生之后不久，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劫持事件。这次是一架利比亚的飞机，幸好没有伤亡。同等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只有在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之下才能设法予以解决。我可以这样说，如果安全理事会在审议恩德培发生的事的同时不去考虑如何对付劫持的话，在我国是一件不可置信的事。不但不可置信，也是不够诚实。我们不能只看事情的一半；必须应付整个问题。

对于劫持，已经采取过一些步骤了。安理会的理事国总还记得我们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日一致通过的决定。其他国际行动有：一九七〇年十二月通过的取缔非法劫持飞机海牙公约；一九七一年九月通过的取缔非法破坏民航安全的蒙特利尔公约；以及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所批准的维护机场和飞机安全的标准和操作方法。

我们认为，现在需要做的是，第一，切实执行已经采取的国际行动，务使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彻底加以遵守。第二，研究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是否还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以补现有措施的不足，以防止劫持行动的再度发生和惩处应负罪责的人。

让我们借近周末所发生的事件作为在国际上采取行动尽量使将来的劫持事件不会成功的催化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解决面前的问题作出真正的贡献，和完成理事会帮助维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的基本任务。

现在，安全理事会必须考虑一个决议，把各个发言者分别强调的各种因素都包括进去；安理会必须慎思熟虑地，而不是偏袒或只顾一面地来考虑这决议。如果安理会忽视了这许多主要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就无法期望它的看法能够获得外在世界即一般老百姓世界的接受；这些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幼，不论住在那里，都可能遭遇到这种暴行，或受到它的祸害。

因此我们和美国代表团的同僚将这些因素都放在一个现在提出来的决议草案中。我们设法把劫持和保证空中旅行安全和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两点都放在一起，草案的起头注意到两个主要当事人的来信，回顾到以海牙和蒙特利尔两公约为例的国际社会对空中旅行安全的关切，以及这两个公约对缔约国所加的责任。我相信这些是我们大家都能同意的看法。

在执行部分，我们一开头便从劫持开始，逐一提到在恩德培结束的事件的始末经过。执行部分的第1段谴责劫持，这是在此每一个人都会谴责的。执行部分第2段具体地讨论在恩德培发生的事；悲悼因劫持而丧失的生命。执行部分的第3、4两段从事实进入此次辩论所讨论的两个原则：一是主权和领土完整，一是国际民航安全。执行部分第3段重申必须依照《宪章》和国际法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执行部分第4段展望未来，设法使国际社会再度寻求进一步的方法来保证空中旅客的安全。

总的来说，这份草案是以公平与公正为存心来为这次辩论提出一个能够得到理事会广泛支持的建议。

这次的辩论必然是一个极为困难的辩论。它牵涉到的问题对我们大家都有影响。一方面领土完整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是与此一样有理由的考虑，即是国家既是为了保护它的人民而存在的，它就有权利，或许说义务，去行使这个权利。

衡量恩德培事件，必须兼顾这两个原则。要兼顾就只有采取美利坚合众国和我国所提出的决议草案中的一途。

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的分歧很深。理事会的责任当然是拉拢这种分歧，而不是加深这种分歧。我因此在向安理会提出这份决议草案时希望大家在吵过一阵之后，理智和法治又会重新抬头。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的代表对我个人的祝贺，特别感谢理查德大使提到我们两国在欧洲共同体中亲密的关系。

森德贝格先生（瑞典）：主席先生，首先请容许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不久以前你曾在本理事会表示希望这个月是一个安静的月份。你的希望显然没有如愿。不过，使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我们是在你的英明和富有经验的领导下进行这次重要的辩论。同时，请亦让我表达我国代表团对圭亚那的杰克逊大使及其卓越的外交部长的深厚感激，他们曾在确实非常繁忙的六月份以外交家的长才处理了我们的事务。

在我们对这个议程项目发言以前，我国代表团还要对朱德委员长的逝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致以真诚的吊唁，他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一直肩负着领导和重要的任务。

由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来担任这一举世瞩目的可怕事件的辩论场合是应该的。这些事件所牵涉的原则对所有国家的安全都有极重要的关系，所以在这里进行讨论是完全正当的。我们的任务是以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为背景来评定目前发生的这件事情。我们务必以公正裁判的精神照顾到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应求平等守法的共同最高利益来履行这一任务。

让我首先代表瑞典政府再次对被劫持的机务人员和差不多所有旅客的得庆生还，表示我们的欣慰。我还要对来自某些国家的许多人的死难再次表示我们的吊唁和哀悼之意。

这次事件起于一小撮极端主义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可恶的恐怖主义行为。象这样的罪行是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许可的。无论其动机为何和情形为何，以无辜的人命来作政治勒索的恐怖行为，必须明白果断地予以谴责的。

我们应该记住这种行径，不论是在平时或把它当作是在武装冲突中的一种制敌的方法，都是一种严重的罪恶。就是在武装冲突的时候，平民也都受到普遍接受的准则的明白保护。因此，恐怖主义者辩称他们的行为是一种战争方法的声明是不能接受的。

现在普遍认为全世界必须对恐怖主义者的行动进行有力的反击，并采取一切可

能的保护措施。为达到打击恐怖主义的广泛国际协定，订出一段公认的国际行动准则还必须作出种种新的努力。我们必须设法使大家承认各国尽一切力量，必要时得与其他国家合作，防止恐怖主义行为的明白义务，更重要的是要不作可能助长这种罪行的任何行动。特别是，劫持者同人质降落的国家必须要愿意在必然困难和棘手的情况下负起保护所有被害人的重大责任。

在我们现在这件实例中，一个不能不问的问题是，乌干达政府有没有遵照上述的原则去做。

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所包含的原则是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我们这些国家所希望的世界秩序的基本。因此，我们大家自当“在〔我们的〕国际关系上应避免为侵害任何国家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之目的，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式，使用威胁或武力之原则”。

这个原则已经在无数场合引述援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所要保护的权利是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认为是基本的权利：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和平生活的权利。支持这项权利对于弱小国家特别具有重要性。因为就是这些国家它们的独立最容易受到威胁，同时也最容易成为外来干预的牺牲品。

除了自卫权利和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第七章所采执行措施以外，对于这一原则宪章概无例外规定。这并不是巧合或疏漏。任何容许使用武力或军事干预来达到某些目的正式例外规定，不论如何可取，都必然会被，特别是大国和强国，滥用和造成一种，特别是对弱國小国的威胁。

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审议中的以色列行动确有对乌干达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一种侵犯之处。我们了解对于这一行动的强烈反应，因为它引起了许多乌干达人民的死难并导致了重大的物质损失。同时，也知道以色列政府和人民面对这个空前的国际海盗行为，眼看他们许多同胞的生命受到的威胁愈来愈大时，所受压力的可怕。而且，当以色列政府作出行动的决定时，它曾握有在它认为显著表明，有责任保护人质的政府并未尽力作出努力它履行这一义务的确凿证据。

所以我们在理事会中面临的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我国政府虽然认为以色列的行动有违宪章的严格规定，但却不能参与在这种情形下对之加以谴责。

我们现在正在审议的这些事件应该可以提醒我们必须加紧设法使中东局势在照顾到所有方面的合法利益下获得政治解决。现状不会产生和平，时间无补于和平。所有各方都有尽力为达成公正持久的和平作出贡献的重大责任。一定要使这个区域的人民最后有安居乐业不受暴力、恐怖和战争的持续威胁的机会。

主席：谢谢瑞典代表夸赞和祝贺。

周南先生（中国）：在今天上午的会上，毛里求斯外交部长阁下以及几内亚、圭亚那、联合王国和瑞典的代表都在发言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朱德的逝世表示悼念。我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衷心地感谢他们所表示的诚挚感情。

下午一时三十分散会